



《宋文鉴》编刊之争再审视

慈 波

内容提要 《宋文鉴》是代表性宋代诗文总集，吕祖谦悬“一代之书”为准的，力破坊本《宋文海》之芜杂孤陋，在编选标准的确立、选源的蒐讨、文类的析分、选篇的择定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书成受赏，又有赐名、撰序的荣耀，但也引起缴还词头、密奏攻击的政治纷争。隐微的历史事件背后，是理学人士与近习势力的一次初步角力。理学家内部对此书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吕祖谦力主弥合周程、欧苏之裂，《宋文鉴》试图将文章与学术、政治理想统合起来，以获得文与理的平衡。这与道学家作文害道的观念分歧显著，却成为南宋浙东学术主流。《宋文鉴》的价值不应局限于文学领域之内，它同时也是全面了解与诠释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南宋浙东学术思想的良好载体。

关键词 宋文鉴；政治；学术；文章；文理会融

吕祖谦《宋文鉴》甄选汇编北宋一代诗文，按照诗、赋、律赋等文体编次，析为 61 门，共 150 卷，是断代总集的代表之作，历来备受推重。章学诚所说“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吕氏之《宋文鉴》、苏氏之《元文类》，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1]，足以反映其“一代之书”的重要价值。

然而南宋初年围绕此书的编刊，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书成上进后，孝宗特旨褒奖，除吕祖谦直秘阁的任命，就遭到陈騏的反对，不惜缴还词头。孝宗钦赐书名，下令刊版，却因大臣秘奏，最终仍是“遂不果刻”^[2]。周必大奉旨撰序，大受孝宗激赏，“后进呈《皇朝文鉴序》，上曰：‘卿之文在廷莫及，真匠手也。’”^[3]吕祖谦一读之后，却“命子弟藏之”^[4]。师友之中也恶评如潮，吕祖谦终身敬畏的张栻对编纂一事很不理解：“如编《文海》，何补于治道？何补于后学？徒使精力困于翻阅，亦可怜耳。”朱熹甚至对吕祖谦的学生声称：“近读伯恭所集《文鉴》，极有可商量处。前辈要亦多浪得名者，不知后世公论竟如何尔？”^[5]纷扰杂乱当中，与淳熙四年（1177）接受孝宗编类敕命时的踌躇满志形成鲜明对照，吕祖谦退居之后

“遂绝口不道《文鉴》事”^[6]。唯一例外的也许要数吕氏门人叶适，他毫不吝惜地称许此书“自古类书未有善于此”^[7]。

编刊一代文集，何以纷纭若此？官员与学者，对此本应具有不同的立场，却俨然意见趋同。让吕祖谦如此耗费心力的《宋文鉴》，不经意间所获关注早已超越文集本身。种种争议，究竟是党争余绪，还是学术分歧，或仅仅是文章好尚的不同？围绕此书编刊产生的种种理解与误解，不妨重新加以审视。

一 “校正”与“大去取”：争论中展开的《宋文鉴》

淳熙三年（1176）十月，在乡居多年之后，因李焘推荐参与重修《徽宗皇帝实录》，吕祖谦除任秘书省秘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此年吕祖谦正好 40 岁^[8]。次年三月，《实录》200 卷成书上进，吕祖谦得到转官一阶的褒劝^[9]。在此期间，吕祖谦博闻强记、长于纂述的才能渐次为人所知。

恰好在这年，孝宗读到了书肆通行的江钊所



编《宋文海》^[10]。这是一部北宋诗文选集，此书“编辑本朝诸公所著赋、诗、表、启、书、论、说、述、议、记、序、传、文、赞、颂、铭、碑、制、诏、疏词、志、挽、祭、祷文，凡三十八门。虽颇该博，而去取无法”^[11]。孝宗似乎对《宋文海》印象不错，“淳熙四年（1177）十月五日，诏临安府校正开雕《圣宋文海》”^[12]。出于对坊本质量的担忧，周必大提出异议，认为需要馆阁官重新董理，以与一代文治之绩相互辉映。

孝宗就人选问题询求大臣意见后，十一月九日正好遇到吕祖谦轮对，于是“上遂令伯恭校正，本府开雕，其日甲辰也”^[13]。李心传认为这是赵雄（1129—1194）推荐的结果：“始赵丞相以西府奏事，上问伯恭文采及为人何如，赵公力荐之，故有是命。”^[14]西府即枢密院，赵雄“同知枢密院事”是此年的“十一月庚子（五日）”^[15]，孝宗征询刚刚升职的赵雄，显示出对人选一事的关心。不过吕氏家族的记述却是另外一个版本：“一日，参知政事王公淮、李公彦颖奏事。上顾两参道周公前语，俾举其人。李公首以著作佐郎郑鉴为对。上默然，顾王公曰：‘如何？’淮对：‘以臣愚见，非秘书郎吕祖谦不可。’上以首肯之，曰：‘卿可即宣谕朕意，且令专取有益治道者。’王公退，如上旨召太史宣谕。太史承命不辞。”^[16]李彦颖举荐的郑鉴以议论切直著称，淳熙三年（1176）孝宗曾特命召试馆职，虽然“策中所言，或是或非”，仍超授校书郎，至此时已升任著作佐郎^[17]。孝宗的沉默应对，应该是顾虑郑鉴虽论事剀切而未必精善文事^[18]。吕祖谦文名日盛，两大臣复不约而同加以荐举，终于促使孝宗择定人选。

事情接下来的发展颇有戏剧性。吕祖谦首先为修订确定基调，即并非校正新刊《宋文海》，而是另起炉灶重加编选，“伯恭言《文海》元系书坊一时刻行，名贤高文大册尚多遗落，乞一就增损，仍断自中兴以前铨次，庶几可以行远。十五日庚戌，许之”^[19]。几天之后，孝宗又追加任命知临安府赵磻老及临安教官两人，辅助吕祖谦的校正工作。围绕校订旧稿还是别选新集，大家未能统一意见。李心传时代仍能看到《孝宗实录》，所述经过颇详：“时祖谦已诵言皆当大去取，其实欲自为一

书，非复如上命。议者不以为可，磻老及教官畏之，不敢与共事，故辞不肯预，而祖谦方自谓得计。”^[20]可见吕祖谦主张“大去取”，放弃了更显简易的在《宋文海》基础上弥缝校正，不惜借助舆论，将重选主张公开化，以先声夺人之势强力推动了“一代之书”的编纂。

“校正”与“大去取”之争，实际上反映了编纂宗旨的不同。皇帝崇重斯文，留意著述，通过刊行著作而强化文治，既能彰显皇朝文化之盛，又能垂范后世，已经超越个人行为而凸显时代意义。在带有“润色宏业”性质的代表作选择方面，周必大从《宋文海》精粗混并、编类芜乱出发，判断此书难以传后，不足以承担这一文化使命。他明确提出需要馆阁有学之士重编本朝文章，是“校正”说的反对者。吕祖谦欣然受命，也与成“一代之书”的理想有关，故而他在接手之后积极排除干扰，最终确立了“大去取”即重新编选的方针。采择文章以映现时代，有益治道，吕祖谦与翰苑词臣周必大就此取得了一致。

二 从坊本到一代之书：《宋文鉴》对《宋文海》的超越

吕祖谦综汇秘籍，勤加铅槧，至淳熙五年（1178）十月，“书乃克成”^[21]。尚未上进，十二月十四夜吕祖谦突患中风，遂请祠求去。孝宗知闻之后，向王淮打听《文海》编纂是否已经完成。淳熙六年（1179）正月二十四，“枢密使王淮宣旨，问所编《文海》次第。公遂以其书缴申三省以进”^[22]。至此，文集编选工作基本完成。根据吕祖谦自述，“所有编次到《圣宋文海》一部，共一百五十四册，并临安府元牒到御前降下《圣宋文海》旧本一部，计二十册。并用黄罗夹复，封作七复，欲望特与敷奏缴进”^[23]，可见是新编与旧本一起呈进。新编正文共150卷，目录4卷，誊写分装为154册，则一卷为一册。旧本《文海》共120卷，分为20册，每册容量与新本不同，应该是维持了坊刻原貌。

国家图书馆今存江钿《宋文海》宋刻残本六卷，所录以北宋为限，卷四古赋、卷五卷六赋、卷



七记、卷八铭、卷九诏。从避讳可知此本刊刻于高宗时期，虽缺乏全本目录与序跋信息，但录文的多样复杂与良莠杂陈足以说明问题。卷六以整卷篇幅收录了崔公度的《感山赋》，是一篇带有汉大赋铺张扬厉色彩的太行山赋，曾受到欧阳修与韩琦的荐赏，自然属于名作。卷五所录崔公度《珠赋》，则被王安石认为胜过《感山赋》，当然也有选入的理由。但卷五同时选录了王令的《藏芝赋》《思归赋》与《竹赋》，则属于摹拟习作范畴而未见高妙。王令在宋人中并不是以赋名家的作手，其集中存赋也仅4篇而已，《宋文海》如此录文，只能从入手材料的便利与贪多务得的数量取胜考量来解释。卷四所选欧阳修《憎苍蝇赋》，是一篇带有俳谐性质的寓言式古赋，并非欧赋之最上乘，也曾受到王若虚的讥弹，以“一代之书”为准则的《宋文鉴》就舍弃了此篇。卷九所录之诏，平泛之作更多。周必大所称的“江钿所编颇失之泛，故其命名有取于‘海’”^[24]，能反映出宋人对此书编选有失泛滥的观感。

在文体分类方面，《宋文海》录有序，却不收跋；注意到碑、志，却不收行状；选录了制、诏，却未收诰、敕；而最具现实意义又能反映时代政治生态的奏疏，却一篇未录，不能不说是最大的缺憾。实际上，《宋文海》的坊刻个性非常鲜明。首先，体例踏杂。在作者的标示方面，或呼名，或称谥、称字，或名、字并用。一人多文之际，或连标作者，或承前省略，缺乏统一体例。其次，校勘弗精。虽然是宋刻本，但文字校勘方面殊难令人满意。其三，主名多误，尤其是主名承前省略的那部分作品。周必大在编订欧阳修文集之际，就发现了《宋文海》录文主名的不可靠：“江钿《文海》多以它人文为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学记》，曾巩文也；《察言论》，唐庚文也。甚至元丰以后暨徽宗朝所下制诏，亦有托公名者，自当删去。”^[25]名作主名也被混淆，制诏之误与卷九之虚托王安石如出一辙。

站在今人的后见立场，《宋文海》的可取之处实在于其文献价值。由于是宋人选宋文，又不收录于他书，此类诗文自然有资辑佚与考订。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由于其他选集皆不辑入，则《宋文海》选文的典范性与认可度仍不免要打上问号。

吕祖谦的编纂工作就是在《宋文海》这样的典型坊本基础上展开的，“此书为《文鉴》所托始”^[26]，难度可以想见。吕乔年以子侄之便，“间得于传闻”，获悉了吕氏编纂的核心要义：“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苏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无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又尝谓本朝文士比之唐人，正少韩退之、杜子美，如柳子厚、李太白，则可以追逐者。如周美成《汴都赋》亦未能侈国家之盛，止是别无作者，不得已而取之。若断自渡江以前，盖其年之已远，议论之已定，而无去取之嫌也。”^[27]这一段话类似夫子自道，既涉及选文准则，又衡论文学现象，尤其值得注意。吕氏已意识到文学发展与时代之间的不平衡，需要以时存文：国初名家名作尚少，不得不放宽入选标准，以反映时代文学样貌；仁宗之后文学步入巅峰期，大家云集，各有专集行世，则只需择要示范。别择之际，既可偶尔以人存文，亦不能因人废文。作品虽未能尽如人意，但也不妨聊备一体。以上四点可以看作总集入选标准。至于北宋断限，则有力避纷扰，追求纂修独立性之意。推重韩杜，则反映了宋人的普遍看法。

朱熹的回忆正好与此相互弥补：“伯恭《文鉴》，有正编其文理之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众人以为佳者；有其文虽不甚佳，而其人贤名微，恐其泯没，亦编其一二篇者；有文虽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先生云已亡一例。”^[28]朱熹提到了入选的四条准则，其中文理俱佳，洵乎名作，这是选文的理想状态，可以看作最高标准。其他如舆论认可、以人存文、以理存文，都反映了面对具体作品时所作出的取舍。综合两人所论，所谓五条凡例，大致也不会偏差太多。

确立编纂准则之后，吕祖谦全力以赴，充分利用当时的最佳图书收藏资源，“尽取秘府及士大夫所藏本朝诸家文集，旁求传记他书，悉行编



类”^[29]，完成了一代文集编选工作。在编选标准的确立、选源的蒐讨、文类的析分，选篇的择定、压卷的揭槩、内容的权衡诸方面，都体现出吕祖谦文献编类之学的精详惬当。《宋文海》终被替代，“《文鉴》行而是书遂晦”^[30]，市场与文化的无声选择，为这一超越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三 政治的两极：攻讦与谀颂

《宋文鉴》的编纂用时不到一年，至淳熙五年（1178）十月编纂告成，吕祖谦却迁延应对，不见起始的风发踔厉。经孝宗催促而不得不上进之后，吕祖谦就不由自主地陷入政治漩涡。事情的发展有悖初衷，吕祖谦渐渐意兴阑珊。个中心曲，吕祖谦向前辈至交李焘进行了倾诉：“《文海》奏篇，异数便蕃。一时纷纷，盖因忿激而展转至此。病中唯静审以处之而已。其始亦未欲以闻，盖累有宣谕，故不敢缓也。”^[31]作为朝官的吕祖谦，敏锐地觉察到政治气候的潜变，却难以置身事外，“一代之书”的编选也由此带有更多政治意味。

围绕《宋文鉴》奏进而引起的风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封还词头、赐名作序及近臣密告。其间层折往复，既有初始的小折其锋，继有中间的峰回路转，最终仍以官方冷遇收场。孝宗对此书具有异于寻常的兴趣，吕乔年以家族亲闻之便，对此有生动的记述：“一日，因王公奏事，问曰：‘闻吕某得未疾，朕固忧其太肥。向令其编《文海》，今已成否？’王公对曰：‘吕某虽病，此书编类极精，缮写将毕，方欲缴进，适值有疾，故未果。’上甚喜，曰：‘朕欲见诸臣奏议，庶有益于治道。卿可谕令进来。’王公即使其从具宣圣谕。久之，乃以其书缴申三省投进。书既奏御，上复谕辅臣曰：‘朕尝观其奏议，甚有益治道，当与恩数。又闻其因此成病，朕当从内府厚锡之。’已而降旨，吕某编类《文海》，采摭精详，与除直秘阁。又宣赐银绢三百疋两。”^[32]足见孝宗对此书其实甚为满意，对于奏议则尤为欣赏，于是对“因此成病”的吕祖谦进行了破格的赏赐。

不过此举遭到了中书舍人陈騏的反对，他拒绝草制，最终引发了孝宗的直接干预，二月七日辅

臣奏事之际，孝宗亲自批示：“馆阁之职，文史为先。祖谦所进《文海》，采取精详，有益治道，故以宠之，可即命词。”^[33]至此陈騏已别无选择，于是起草制词。制语虽貌似引用孝宗批旨而加褒奖，但“行之不诬”“人斯无议”等语，借规切之词却暗含讥讽，实即“假王言以寓诬诋”。当然此举终属于事无补，“公辞免职名至再，竟不允，乃拜命”^[34]，孝宗仍以值秘阁的帖职，对吕祖谦特示恩数。

此事既定，孝宗下旨命周必大为此书作序^[35]。四月辛卯（三日），序文上进^[36]。此文谓文辞盛衰与政治道德相表里，有强烈的尊宋意识，张大“我宋之文”，突出宋代文章之盛远胜前朝，甚至称颂“皇帝陛下天纵将圣如夫子，焕乎文章如帝尧”^[37]，是一篇典型的润色宏业、铺张盛世之作。孝宗自然很满意，十天之后，周必大特转一官^[38]。而此时吕祖谦已经得祠东下，回到婺州了^[39]。

赐名撰序之后，《宋文鉴》正待“下国子监板行”^[40]，却又忽起波澜。这次是出于密奏，“会有近臣密启，云所载臣僚奏议有诋及祖宗政事者，不可示后世”^[41]。孝宗最看重此书的就是具有鉴戒作用的奏疏部分，密奏指责“所载章疏皆指祖宗过举，尤非所宜。于是上亦以为邹浩《谏立刘后疏》语讦，别命他官有所修定”^[42]。废孟后、立刘后是哲宗亲政时期重要政治事件，邹浩之疏风节凛然，切直无忌，在当时影响极大，不过孝宗还是命令崔敦诗进行修改。崔敦诗所作只是部分修订，对于邹浩文字的处理，尤其值得关注：“至如名在当世，号称直臣，言虽有疑不可登载，亦不可无，聊以备一人之作，如邹浩之类是也”^[43]，则崔敦诗并未投鼠忌器，将邹浩文字删尽了事，而仍旧坚持以人存文。

事情并未随着崔敦诗删定上呈而结束，因为对《宋文鉴》的攻击还包含了其他作品，据说“有媚者密奏云：‘《文鉴》所取之诗，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是乃借旧作以刺今。’”^[44]《孝宗实录》相关记述可作补充，“及书成，前辈名人之文搜罗殆尽，有通经而不能文词者亦以表奏厕其间，以自矜党同伐异之功，荐绅公论皆疾之”。李心传指出：“史臣所谓通经不能文词，盖指伊川也。时侂冑方以道学为禁，故诋伯恭如此，而牵联及于伊川。”^[45]可



知对《宋文鉴》选文的指斥，既重点指向奏疏，又包含了诗歌，同时道学家身份也给程颐的入选带来质疑。“能文词”的要求流于形式，表明攻击者其实并不了解吕祖谦编纂的主旨。李心传认为这一指责的书写方式还与《孝宗实录》成书的宁宗时期政治风向有关，此时韩侂胄实行党禁，道学被斥为伪学，于是道学家的选文问题被放大。正像朱熹所说的那样，“吕丈编奏议，为台谏所怀挟”^[46]，本应顺理成章的《宋文鉴》刊版，最终却是不了了之。

对于这一纷争，不妨回看吕祖谦本人所作“因忿激而展转至此”的定性，如果能够结合孝宗时期的政治生态，对之当能形成更全面的认识。淳熙之后，孝宗即位已逾十年，政权运作日益得心应手。崇尚“乾纲独运”，重用近习，以内批来进行人事任免，成为孝宗惯用的平衡外廷权力的工具，而这也渐渐引起了有识臣僚的不满。

淳熙四年（1177）终于发生了反近习的标志性事件。五月二十五日，“谢廓然赐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之命自中出，中书舍人林光朝不肯书黄”^[47]。林光朝甘犯雷霆之威，却并未促使孝宗收回这一“轻台谏、羞科目”的任命^[48]，因为谢廓然得到了强力支持，“廓然，附曾觐者也”^[49]，而曾觐为孝宗潜邸旧人，是恃宠弄权的近习代表。实际上孝宗任用谢廓然并非简单因其投身曾觐，亦有平衡牵制外廷权力之虑，故周必大看出“上用廓然，意固有在”^[50]。

事虽不济，但林光朝的抗章举动一时震动朝野，士气大振。吕祖谦作为林光朝好友，不禁大喜过望。在接下来的轮对中，吕祖谦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向孝宗郑重提出了专断与近习问题。在委婉指明近习扰政已端倪渐显之后，吕祖谦提出了忠告。孝宗显然深信自己的驾驭能力，对近习之弊不以为意。倒是谢廓然攻击龚茂良结党，引起了他的警惕^[51]。相对于自幼陪伴自己的内侍近臣，孝宗更担心的是外廷士大夫。以吕祖谦一门四相、七世簪缨的显赫家世与其本人的博综通达、宽厚恭谨，他身上无疑承载了相当多来自朝野上下的期待。而他先后于乾道八年（1172）与淳熙五年（1178）为省试、殿试考官，更扩大了他的文化影响。吕祖谦与张栻、朱熹、陆九渊、薛季宣、陈傅良、陈亮、

周必大等人的密切交往，都显示了他在当日已隐然具有的思想领袖地位。淳熙入朝，尤荷众望：“吕伯恭在馆中，人谓且入西掖、北门矣。”^[52]出于相近的学术思想与政治主张，朝中的理学人士也渐有形成松散群体之势^[53]。

吕祖谦对于劄子内容有充分准备，来自孝宗的实际回应未免令人失望，甚至引起了远在静江府的张栻关注：“伯恭既已转对，恐当为去就计。近见台臣论程学云云，如伯恭在彼，尤不应忽然也。”^[54]他与朱熹所谈论的台臣攻击程学，正是淳熙五年（1178）正月的事情，“侍御史谢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55]，得到了孝宗首肯。谢廓然将程学与新学相提并论，禁止科举以其学说取士，貌似平允，但以此时新学备受弹压的际遇可知，谢廓然对程学实为肆然攻击。此后赵彥中、郑丙、陈贾、林栗等人变本加厉，终于激成韩侂胄当权之际的道学之禁。正像王夫之慨然指出的那样，以道学为名而蠹君害士，“谢廓然之倡之也”^[56]。

也就在此稍后的二月，发生了陈騏缴还词头事件。陈騏“再上缴章”的举措有借题发挥的嫌疑，所以孝宗“皆留中不行”^[57]，坚持了除命。最终陈騏借起草制词暗寓贬词而发泄了不满情绪，这并非光明正大之举，却也反映了其时的政治氛围。需要特别一提的是，陈騏与谢廓然属于乡党，两人都是台州临海人。自谢廓然出任台官以来，理学人士与近习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多人开始不安于朝。继林光朝斥外后，吕祖谦的好友陈傅良也因为“浸有相嫉者”，渐渐感受到压力，开始寻求外任。吕祖谦加以慰留，“吕公祖谦方在三馆，谓公曰：‘盍少留？’公曰：‘出处之义，不敢不谨其始也。’”陈傅良于是在淳熙五年（1178）十月，“添差通判福州”^[58]。同时外任的还有石斗文，他激切反对近习用事，曾抨击朝廷“创开便门，不知便门之私，乃复滋甚”^[59]。当此之际，吕祖谦不免落寞，他将近况告诉陈亮：“朋游散落，益复鲜况。适当天民、君举相继引去之后，又不欲成群队，只得痴坐静待而已。”^[60]虽然对朝政仍有谨慎观察的期待，但绝去“群队”之迹，可说明他已颇为警惕了。

其实这一时期周必大同样不安于位。淳熙五年（1178）正月，周必大连上《乞郡劄子》《再乞



外任劄子》，未获允。五月请对之际丐外。闰六月因“微闻言官谢廓然相忌”，十四日上《再乞去劄子》；七月复有《第三乞外劄子》。急切求去的原因，则是对近习纠结台谏排挤士大夫的不安：“会谏议大夫谢廓然乞令朝士久次者听更迭补外。于是吏部尚书韩元吉、侍郎李椿相继得请。或谓臣污朝最久，廓然未必不相及。”^[61]此后周必大改变策略，请求祠禄，由于孝宗坚决不允方才作罢。吕祖谦对这一切变动深为关切，他告诉外任常德的李焘：“周丈自春来请去之章已四上。李寿翁亦以病告经月。陈能之入史院一日即得眩瞤之疾，迄今未平。大抵目前善类或去或病，悒悒殊鲜况也。”^[62]从他周必大、李椿与陈举善合称为“善类”来看，这一松散的同入共同体是隐然存在的。而求去中的周必大，也表现出对吕祖谦的汲引。孝宗以为周必大乞外有翰苑职事繁剧的原因，提出召人与之分力，“因问吕祖谦能文否，公奏：‘祖谦不但能文，极知典故。翰苑须常用有学问之人，乃为有补。’”^[63]当然这一举荐恐怕也带有副作用，吕祖谦仕宦前途看好，对于“媚者”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只会成为密奏攻讦的催化剂。

密奏者究竟是谁？由于《宋文鉴》其时并未刊行，能知悉其书详细情况的人是很有限制的。有宋人记事一则提出，“东莱修《文鉴》成，独进一本于上前。满朝皆未得见，惟大珙甘昺有之，公论颇不与”^[64]。颇有指责吕祖谦将《宋文鉴》呈送一套给甘昺之意，这当然不会是事实，但这一谣传提示了重要信息：除了孝宗之外，最可能知晓此书情况的就是日常侍卫皇帝的近习了。文中所说的甘昺在此后的宁宗过寿康宫事件中曾发挥重要作用，贵宠一时。其兄甘昇是孝宗亲信，早在乾道年间就已权势煊赫，故甘昺确实具备接触到《宋文鉴》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时曾觌以使弼领京祠，王抃以知合门兼枢密都承旨，昇为入内押班。相与盘结，士大夫无耻者争附之”^[65]，是淳熙时期近习用事的标志性事件。在近习与外廷士大夫对立之势渐成的情况下，以《宋文鉴》录文偏颇为藉口，假手台谏肆加攻击，应不违背事件的发展逻辑。

即使是暂获安定的周必大也不得不改变此前的立场，向现实政治的压力妥协。他对孝宗宠任曾

觌的态度趋向圆滑^[66]，这是周必大“政治成熟”的表现，为他此后的通达宦途铺平了道路，他与理学人士的关系也渐由亲近趋向分离。周必大应制草就的《皇朝文鉴序》，更属于典型的润色皇猷性质文字，难辞谀颂之嫌。当序文寄达婺州时，吕祖谦以冷处理的方式含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其实无论是攻讦还是谀颂，两种悖反行为的背后，同样缺失的都是对《宋文鉴》本身价值的关注。“一代之书”沦为政治工具，意味着其学术独立品格的缺位，这与吕祖谦的初衷构成了巨大反差。笔者倾向于将围绕编刊而产生的争议，纳入政治史视野加以解读，将之视作逐渐获得经典阐释话语权的理学人士与代表皇权的近习势力的一次初步角力。虽然理学群体渐次积聚，但在政治诉求上只能说具有松散的近似性，而难以形成致密的统一体，尚不具备政敌所惯斥的“朋党”特征。特别是隐具思想领袖地位的吕祖谦借身体原因退出纷争，并从此别离政坛，更使两者间的张力骤然消于无形。十多年后当朱熹成为理学群体的核心之际，由于处事方法、个人性格以及政坛人脉的差异，双方力量的对立陡然鲜明，而编刊事件只能算是后此对立的萌蘖形态，纷争或不妨被视作远更矫激的庆元党禁的一次较小范围、极低烈度预演。当叶适指责“此序无一词不谄，尚何望其开广德意哉！盖此书以序而晦，不以序而显，学者宜审观也”^[67]，虽不无慨乎言之的意味，但他对序文矮化《宋文鉴》学术性的指认，无疑深刻而又敏锐。

四 文与理：理学家的分合

《宋文鉴》的编刊引起政治纷争或尚能理解，但在理学同人之间，也同样激起不同意见，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刘克庄就已注意到这一内部分歧：“本朝文治虽盛，诸老先生率崇性理、卑艺文。朱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鉴》去取多朱氏意；水心叶氏又谓‘洛学兴而文字坏’。二论相反，后学殆不知所适从矣。”^[68]刘克庄称赏东莱门人楼昉的《崇古文诀》“尚欧曾而并取伊洛”，期待它“与《文鉴》并行”。这启发我们思考，属于文集的《宋文鉴》如何处理文与理的关系？



伴隧道学的兴起，文与理的对立在北宋中期变得显豁：“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会融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逮至叶公，穷高极深，精妙卓特，备天地之奇变而只字半简无虚设者。寿老一见，亦奋跃策而追之几及焉。”^[69]在吴子良梳理出的脉络中，吕祖谦、叶适、陈耆卿，当然也还包括他自己，都明确意识到文、理割裂之弊，而刻意强调文理会融。他们文辞高妙，自然在性理的成就上也相应不俗。正因为吕氏会融文、理的主张，文在浙东一系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内涵及地位，也与道学家所轻视的文辞区别明显。而吕祖谦编修《宋文鉴》，性质上亦非仅是文学的选录与编排，更带有文理会融的学术特征。

东莱友人对《宋文鉴》的编纂一直较为关心。淳熙五年（1178）冬天，陈亮还向他打探：“《文海》已编成未？”^[70]而张栻在得知吕祖谦因劳成疾后，在致朱熹的一封信中，此事竟占据了全部篇幅：“伯恭近遣人送药与之，未回。渠爱敝精神于闲文字中，徒自损何益？如编《文海》，何补于治道？何补于后学？徒使精力困于翻阅，亦可可怜耳。承当编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今病既退，当专意存养，此非特是养病之方也。”^[71]《宋文鉴》在张栻看来只是“闲文字”，这当然是崇理抑文的理学式偏见。

朱熹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这位宋代文学成就很高的道学家，就编书一事与吕祖谦保持了密集的交流，两人文集中现存就有八封书信讨论及此。他的关注点集中于义理，文辞居于从属地位。他晚年告诉学生：“伯恭《文鉴》去取之文，若某平时看不熟者，也不敢断他。有数般皆某熟读底，今拣得也无巴鼻。如诗好底都不在上面，却载那衰飒底。把作好句法，又无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无好意思；把作劝戒，又无劝戒。”这与信中所说相似而更显豁，即以为选目不佳，而诗歌尤其不可人意，内容、形式、讽劝，尽显不足。另有学生记录，则称“伯恭《文鉴》去取，未足为定论。”结合其他所述，如“东莱《文鉴》编得泛，然亦见得近代之文”“伯恭所编奏议，皆优柔和缓者，亦未为全是”^[72]，可见朱熹对《宋文鉴》最终呈现的

选文标准不太认同。所谓泛、和缓，都指向选文的经典性，也即不符合朱熹首讲义理的要求。朱熹确实在编选标准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但在篇目甄别上吕祖谦其实与朱熹分歧甚大，苏轼的诗文在《宋文鉴》中是入选数量最多的，即是显证。

对《宋文鉴》作出全面评述的，当属吕氏门人叶适。由于亲承海论，叶适对于此书的主旨，甚至个别篇目入选的用意，都有切至的体会。他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对《宋文鉴》进行了逐篇析论，认为此书“因文示义，不徒以文，余所谓必约而归正道者千余数，盖一代之统纪略具焉。”^[73]契合吕祖谦合周程、欧苏之裂的会融主张，也体现了修成“一代之书”的学术期待。叶适强调此书“欲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虚文为主。”^[74]这是大判断，包蕴丰富。《宋文鉴》的学术理想，是通过别择合乎准则的“文”以合于道，从而为一代政治提供范式。

从内在学理而言，吕祖谦、叶适一系列浙东理学家，对文与理协认识一脉相承，而与道学家保持了距离。文理会融的主张，在浙东学术中不断张大，至元明之际，终于通过《元史》的修纂而成为思想主流。《元史》将文苑传并入儒林，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75]，不失为吕、叶学术思想的后世知音。《宋文鉴》在理学人士中引起分歧，是南宋时期学术争鸣之际浙东一系主张尚未取得共识的表现。在叶适积十六年劬劳而成的《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中，凡经十四卷，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而以《宋文鉴》收束全书，独占四卷，且《宋文鉴》是唯一的集部作品，也是叶适唯一论评的宋人著述。叶适高自赏誉的，“独吕氏《文鉴》去取最为有意，止百五十卷，得繁简之中，鲜遗落之憾”^[76]，盖有深意存焉。

余 论

论及吕祖谦的学术成就，学界多以“得中原文献之传”誉许之。此说虽凸显了吕祖谦的学术地位与渊源，却往往忽视吕氏慨然以中原文献自任的担当与勇气。《宋文鉴》的编纂写校，即为这一文化精神的突出写照。吕祖谦承命不辞，以积极主动



姿态介入，体现了铨择一代文献的使命意识。通过对文理会融的引接，《宋文鉴》试图将文章与学术、政治理想统合起来，以获得文与理的平衡。这是对北宋中期以来理学诸家兴起时学术和鸣状况的复归，而寻取文章与科举的平衡成为他们特别留意的途径。

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包含考察经学知识的经义、评估文学水平的诗赋以及衡量政治与历史能力的策论。这三方面内容正好构成了理想型士大夫完备的知识素养。南宋浙东一系理学人士与科举的密切关联，与道学人士的鄙弃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吕祖谦甚至将应举与读书打通，他曾表示：“人能以应科举之心读书，则书不可胜用矣，此无他，以实心观之也。”^[77]而朱熹对于吕氏“留意科举文字之久”的不满^[78]，早为大家所熟知。在《宋文鉴》中，吕氏特别选录了属于科举时文范畴的律赋、论、策、制策、经义及策问，更展示了别具只眼的识力。

浙东一系对于史学的推重，尤其与道学家凿枘不合。浙东士人所见宽宏，史学、制度及至现实世界中的各专门分野，无不可纳入“理”来认知，故其所倡文理会融之说，实将文章、政治与思维规律绾合为一，其学术带有强烈的现实性。《宋文鉴》选录反映政治生态的奏疏、田里疾苦的诗作，是“理”对于政治生活的深度关切与介入，也是其“文章”内涵的丰富性体现，与道学家重视“理”之理性超越径路不同。浙东士人所表现出的博物倾向、知识考古特征，也不妨向此溯源。

邓广铭早就提出：“文学、史学方是浙东各家学术的汇流之地，也即是浙东学术的主流所在”，“若作为一个整体而看浙东之学，则正是熔铸性理、经制、文史三方面的学问于一炉之内的。”^[79]蒙文通也主张：“北宋之学，洛、蜀、新三派鼎立，浙东史学主义理、重制度，疑其来源即合北宋三派以冶于一炉者也。”他还进一步阐释了浙东一系“文章”的涵义与学术渊源：“浙东之文章本之经史，以义理、考证润饰辞翰，其末流亦大率如此，倘本之蜀者，尤多合北宋三派以为一者也。”^[80]这种大判断与吕氏欲合周程、欧苏之裂的努力正相吻合。故而若将《宋文鉴》单纯视为断代文学总集，

无疑是对吕氏学术思想的弱化。此书价值不应局限于文学领域之内，它同时也是全面了解与诠释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南宋浙东学人学术思想的良好载体。叶适所说的“后有欲明吕氏之学者，宜于此求之矣”，^[81]真可谓深入腠理的知音赏会之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吕祖谦《东莱博议》与科举试论研究”（批准号17BZW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内篇一，第4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9][24][35][36][38][50][61][63] 周必大：《周必大全集》，第1677页，第617页，第1029页，第26页，第26页，第1707页，第117页，第192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 楼钥：《楼钥集》卷九十九，第173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4][6][16][21][27][32][37][40][42][44][57] 吕祖谦：《宋文鉴》，第2118页，第2118页，第2117页，第2117页，第2118页，第2117页，第1页，第2118页，第2118页，第2118页，第2117页，中华书局2018年版。

[5][78]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卷三十一，四部丛刊本。

[7][67][73][74][76][81]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第695页，第696页，第755—756页，第695页，第547页，第756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8][22][23][31][34][39][60][62] 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一册，第745页，第747页，第60—61页，第703页，第748页，第748页，第475页，第70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0] 诸书所引多作“江佃”，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皇朝文鉴》解题中，引及周必大上对之语，称“此书江佃类编”。然《玉堂杂记》卷中正作“乃近时江佃编类”，故“江佃”实误。《太史公编〈皇朝文鉴〉始末》亦引周必大奏事语作“江佃”，同误。

[11]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二十，《宋文海一百二十卷》解题，第10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书中“疏词”点断为“疏、词”，则为两种文体。



[12] 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五,校勘经籍,第28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13][14][17][19][20][29][33][41][45]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596页,第596页,第632页,第596页,第597页,第596页,第596页,第597页,第597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15] 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八淳熙四年,第1233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

[18] 实际上吕祖谦与朱熹都对郑鉴的学养有所保留。吕祖谦以为他“失在不学”,见《与朱侍讲》,《吕祖谦全集》第一册,第427页。朱熹更直言不讳地批评郑鉴“前日文字固为割切,但论事多而理论少”,见《答郑自明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25]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外集卷九之末,曾三异校语,四部丛刊本。

[26]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三,《新雕圣宋文海五卷》解题,光绪常熟瞿氏罍里家塾刻本。

[28][46][7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954页,第2954页,第2954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

[30]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十五,《新雕圣宋文海残本六卷》解题,第598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

[43] 崔敦礼:《宫教集》卷五,《进重删定吕祖谦所编〈文鉴〉劄子》,四库本。按崔敦诗为崔敦礼之弟,四库所收《宫教集》系《永乐大典》辑佚本,提要指出劄子或为《大典》误题,或为敦礼代作。故将之视为崔敦诗作品,亦无不可。

[47] 留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五,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48][49][55][65][66] 脱脱:《宋史》,第12863页,第11845页,第667页,第13673页,第1369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51]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淳熙四年六月,第3884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52] 王炎:《双溪类稿》卷二十四,《送相士张舜举序》,四库本。

[53] 理学、道学及宋学诸概念由于外延的宽狭不同以及内涵的部分交叉,颇易致混淆。本文对于宋代所兴起的有别于汉唐训注解经方式、强调理性思辨、主于辨伪疑难的儒学思潮,多用理学一词。而对于程朱一系重视理论体系建构、偏于内圣、强调传承派系脉络且带有较强理论排他性的儒学思潮则使用道学一词。在南宋特定的语境中,道学因贴上党派攻讦标签而往往带有贬义色彩。

[54][71] 张栻:《张栻集》,第1123页,第1132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

[56] 王夫之:《宋论》卷十三,第227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58] 孙锵鸣:《陈文节公年谱》,敬乡楼丛书本。

[59] 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二十三,《枢密院编修石天民斗文》,明天启刻本。

[64]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四库本。

[68] 刘克庄:《刘克庄集笺校》卷九六,《迂斋标注古文》,第4049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69] 林表民编:《赤城集》卷十七,吴子良《簪窗续集序》,明弘治刻本。

[70] 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十七,《与吕伯恭正字》,第25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75] 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传序》,第4313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77] 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二册,《丽泽论说集录》卷十,第25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79] 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第十卷,《浙东学派探源》(1935年8月29日),第27—2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80] 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史抉原》,《致柳翼谋(诒徵)先生书》(1935年9月),第414—415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李超